

域内外民俗学丛刊
yuneiwai minsuxue congkan

迷信



[奥]G·贾霍达 著 曹 阳 译
陈建宪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域内外民俗学丛刊

迷信

[奥]G·贾霍达 著

曹 阳 译

陈建宪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The Psychology of Superst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ublished in Pelican Books 1970

Copyright C Gustav Jahoda 1969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何礼蔚

迷 信

【奥】G·贾霍达著

曹 阳译 陈建宪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17,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21-1025-7/K·79 定价：5.80元

（沪）新登字 103号

揭开人类迷信的沉沉帷幕

(中译本序)

近年来，我常常为中国大地上卷起的一股股迷信狂潮而震惊：

在我的家乡湖北省东部，只要见到树龄较老或形状奇特的古树，上面必挂有各种红布块及“有求必应”的匾额。我们那个小镇上，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医院，院内长着一棵三四人合抱不过来的巨大银杏树。人们在医院打完针吃完药，就到树下去烧香磕头。病好了，医药费可以欠着不缴，为这棵树挂红布或匾额却不可少。现在这棵珍贵的古树已快被终日缭绕的香烟熏死。

我在一所大学讲民俗学课，常常听到学生们向我叙说他们家乡的迷信。有的学生告诉我

他们那里如何为病儿叫魂，有的学生告诉我他们那里如何以筷子占卜，有的学生讲他们那里如何请灵姑（一种据说可与死去祖先通话的巫婆），有的学生讲他们那里的祭祖先……最令我吃惊的是：在某老革命根据地，一个大革命初期牺牲的著名烈士，在他的家乡竟变成了新的土地神。田间地头村口，到处可见以几块破砖垒起的简易祭坛。人们对修烈士纪念塔无动于衷，对修他的庙宇却热心捐款。有关这个新土地神的传说，在民间暗暗流传，越传越神。

漫步街头，常常看到路边一群群人围着的算命者。据有关调查，这些算命专业户生意兴隆，早已先富起来了。有的地方据说竟出现算命一条街，它与服饰一条街、小商品一条街竞争，只赢不输，因为算命者们永无亏本的风险。尽管政府对其严加打击，仍然屡禁不绝。

逛逛书摊，就知迷信决非仅限于受教育较少、愚昧落后的乡下人。书摊上，各种有关迷信的书籍：看相、算命、八卦、风水、奇门遁甲、推背图……在科学探索、民俗研究、文化传统的旗帜下，一枝独秀。（顺便说一句，我并不反对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应以科学的态度，不能拿它作

幌子卖钱害人。)事实上这些书中也有些态度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为数不多。甚至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中,人们对看手相、占卦的兴趣,也不亚于看足球和跳迪斯科。

迷信活动的猖獗,造成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轻者被骗钱财,重者殃及性命。1986年10月1日,在桐柏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中,一百多名迷信者身着升天服装,带着刻有“皇帝寿”的朱红大印,准备喝农药集体升天。由于公安局及时制止,才使这场类似美国“人民圣殿教”教徒的集体自杀惨剧没有在中国重演。迷信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只要随手翻翻报刊杂志,经常可以看到这类报道。

在当代中国,究竟存在着多少种迷信?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得到精确的答案。概而言之,大略可以归纳为如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例如烧香问卦、算命、求菩萨等等。这类迷信不仅占的比重最大,而且许多有了新的发展。过去人们在丧葬仪式中烧些纸钱,最多烧点纸屋纸船,现在除这些外,还有冰箱、彩电、汽车、存款单乃至城市居民户口证。在沿海一些地方,

商店里到处供着巍然端坐的财神爷，而神像前那塑料制成的几乎可乱真的蜡烛，顶端点的却是电灯。

第二类迷信是新产生的。去年我在深圳，常看见汽车驾驶室挂有毛主席像，感到奇怪，一问朋友，原来说是毛主席已成神了，他的像可保佑司机不出车祸。这种现象现已流传到内地。

第三类迷信，是从国外传入的，例如连锁信。几年前，我在某图书馆工作，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落款地址为“内详”的信。为了让尚未见过此类信的人们一饱眼福，这里抄录如下，奇文共赏之：

幸运降临：

佛：此信是金锁链，在九天内就会降到你的身边。你收到信后，要在九天内抄写二十份送给你的朋友，幸运就会降临。不要怕花钱，不要怕麻烦，也不要对别人说，这样对你有利。此信源于江苏某地。一天，一个女学生在路上碰到一位仁翁，仁翁从怀中拿出信，对她说：“你把信抄写二十份，在九天内发给你的朋友。”说完仁翁就不见了，这位女学生把信抄了二十份，送给她的朋友，九天后就得到了巨款。有个老头收信后不相信，没有照

办，九天后吐血而死。有个叫小华的女学生收到信后也不相信，没有照办，死于车祸。有个教授收到信后，抄了二十份，发给他的朋友，九天后他的儿子考上了研究生。这不是迷信，千真万确！

请你收到此信后，将信抄写二十份，在九天内发给你的朋友，以免遭不幸，千万！千万！

发信不留姓名，落笔：佛。

顺便说明一句，我收到这封自称“不是迷信，千真万确”的信已经好几年了，当然没有照信中的要求去办，但这几年并没有碰上什么不幸。

有人说，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中国人宗教信仰淡薄，迷信胜于宗教。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西方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例如十字军的东征；而中国历史上却没有这种现象。在中国老百姓中，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只要需要，什么神都拜。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道教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儒教的孔夫子；基督教的上帝；甚至连原始崇拜中的神树、神石等等，济济一堂，互不冲突。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单一宗教信仰的观念，因此，在中国民间精神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不

是宗教,而是迷信。

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从五四运动以来,许多仁人志士都曾大声疾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毛泽东同志在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曾这样写道:

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以他那枝犀利的笔,写下了《祝福》、《药》等等名著,刻画出中国封建社会中那些不仅身受政治经济压迫,而且深受迷信毒害的可怜的灵魂。他的许多杂文,入木三分地分析和批判了国民的迷信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造成迷信的封建专制制度,表现了极大的愤慨与反抗。

随着人们对迷信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开始以科学的态度，考察中国民间的迷信思想与行为。1906年，蔡元培先生译出日本学者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书中对各种迷信现象进行了分类和批判。1920年，在蔡元培先生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该会不仅研究民间歌谣，而且调查研究了包括民间迷信在内的许多其他民俗事象。像顾颉刚先生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两个出殡的导子帐》、《东岳庙七十二司》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更加积极地开展风俗调查与研究活动。同年，还出版了由乔峰（即周建人）等合编的《迷信与科学》一书。1926年，广州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进行了大量民俗研究，出版了《灶神考》、《福建三神考》、《迷信与传说》等有关专著，其中研究迷信成绩最大的，是顾颉刚和江绍原。顾颉刚对妙峰山、东岳庙、泉州土地神、苏州婚丧风俗等，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分析。江绍原的《发须爪》和《血与天癸》，是两部有关中国迷信专题研究的力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在1926年就在中山大学开辟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敢讲的《迷

信研究》课，1929年，他又在北京大学讲授了《礼俗迷信研究》，这使迷信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走上了大学讲台。三十年代，迷信研究在全国各地更为普遍，出现了更多对具体的迷信事象的调查研究，例如占雨谣俗、谶诗、祖先崇拜、造房仪式、行船禁忌、送灶接灶等等。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将神话、诗歌与信仰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很大成绩。

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无神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社会上封建迷信有所抬头的现象，对迷信的科学研究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迷信为什么会流行呢？有哪些迷信流行呢？迷信的“根”扎在哪里？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凡是迷信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吗？迷信的未来怎样？……所有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密切关注与极大兴趣。

迷信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中国有，即使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西方社会，迷信活动也十分盛行。1978年，南美洲圭亚那热带丛林中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九百一十二名“人

民圣殿教”的信徒，在教主杰姆·琼斯号召下，为了摆脱生命这个负担，集体服氯化钾自杀。“人民圣殿教”是美国的一个迷信团体，这个惨案的发生，证实了西方迷信活动十分猖獗的事实，也证实了这本《迷信》的作者 G·贾霍达的先见之明。

贾霍达作为一个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又在非洲对巫术和迷信有着大量感性认识的心理学家，在他这本启人心智的小书中，运用大量的调查统计和实验研究资料，对迷信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多侧面的透视与解剖。书中不仅到处可见作者的真知灼见，而且可以了解西方许许多多学者探索的足迹。一些研究迷信的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如早期人类学派的泰勒、弗雷泽；心理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荣格；行为主义理论的巴甫洛夫、斯金纳；发生心理学的皮亚杰；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等等，在本书中都得到一定的评述。可以说，这本书可以看作一部简明的西方迷信研究史。从这面镜子里，不仅可以窥见西方有关迷信的种种理论，而且可以看到他们采用的种种研究手段与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这些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迷信很

有参考价值。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转折关头，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遗留在中国民众身上的愚昧与迷信，是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研究迷信，消除迷信，是一项十分重大而艰苦的工作。一个民族前进的步伐，与该民族思想解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而一个民族思想的解放，取决于对新旧迷信的破除。十年内乱期间，我们民族饱尝了现代迷信带来的苦果，这个惨痛教训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越是持有偏见的人，越是迷信。这是几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受法西斯迫害的科学家们所研究出的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东西，不能抱有偏见，既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也不能以为一拿过来就是解决中国迷信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正如医生治病，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药物的效果会有所不同。不过，我们不妨多了解一些药物的性能，这样在开药方时就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对症下药。

最后，说说这本书的来历。1991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国际知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夫妇

来我校访问，我在与他会谈时曾讨论过迷信问题。他见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回国后就寄来这本原名为《迷信心理学》的英文书。后来我请武汉钢铁学院的曹阳同志将此书译了出来，并由我对译文进行了校订，并将书名改为《迷信》。可以说，没有邓迪斯先生的赠书，没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秦静同志的热心鼓励与细致工作，这本书中文译本的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至于译者和校者，只是做了些搬运夫的工作。由于对西方迷信活动及其理论了解不深，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陈建宪

1991年9月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

G·贾霍达(Gustav Jahoda)于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曾就学于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服完兵役后,他在牛津一个大型壁画团体任指导教师,后来又执教于曼彻斯特大学。1952年起他任职于黄金海岸大学(今加纳大学)教研所。这段时期以及后来的几次非洲旅行中,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有关跨文化方面的形态、观念及发展心理学的比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巫师与拜物教术士。由于他们的知识、技能及见识,使贾霍达改变了他最初的偏见。同时,贾霍达还惊奇地发现,不仅他们,而且许多受过西方教育、具有很高知识水平与能力的人们,都坚定地保持着关于行使巫术与魔法的信仰。这使他产生了将迷信作为一个心理学课题而加以研究的极大兴趣。1956年贾霍达

回到英国，任教于格拉斯哥 (Glasgow) 大学，1964年他定居于斯特拉斯克莱德 (Strathclyde) 大学。他的其他著作还有《白人》(White Man, 关于非洲人对欧洲人态度的研究)，以及大量关于跨文化的社会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的论文。

贾霍达教授已婚，有四个子女。

目 录

揭开人类迷信的沉沉帷幕

(中译本序).....	陈建宪
作者简介.....	(1)
第一章 迷信是什么.....	(1)
第二章 迷信的盛行.....	(28)
附录.....	(46)
第三章 迷信作为谬误.....	(58)
第四章 迷信与无意识.....	(92)
第五章 迷信作为条件反射.....	(123)
第六章 迷信作为社会现象.....	(150)
第七章 迷信作为思维方式.....	(170)
第八章 迷信与未知事物.....	(220)
第九章 迷信的未来.....	(239)